

SHIQI SHIJI ZHONGGUO TONGSU XIAOSHUO

17世纪中国通俗小说

BIANNIANSHI

编年史

◎ 李忠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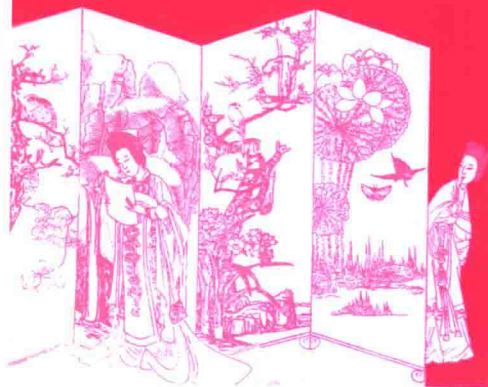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

◎ 李忠明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7 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 / 李忠明著.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3.3
ISBN 7-81052-635-9
I. 17... II. 李... III. 小说史: 编年史—中国—
明清时代 IV. I207.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3074 号

17 世纪中国通俗小说编年史

李忠明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印刷 合肥中德印刷培训中心印刷厂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开本 850 × 1168 1/32
联系电话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张 9.625
电子信箱 ahdxcchps@mail.hf.ah.cn	字数 226 千
责任编辑 鲍家全	版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封面设计 张 卉	印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635-9/I·53

定价 19.8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序 论	(1)
一、17 世纪通俗小说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	(1)
二、17 世纪通俗小说发生发展的文学背景	(8)
第一章 1601—1610 年	(22)
一、本时期刻印、传抄、创作的小说作品目录	(23)
二、本时期小说界的基本情形及其分析	(27)
第二章 1611—1620 年	(41)
一、本时期刻印、传抄、创作的小说作品目录	(41)
二、本时期小说界的基本情况及其分析	(46)
第三章 1621—1630 年	(62)
一、本时期刻印、传抄、创作的小说作品目录	(62)
二、本时期小说界的基本情况及其分析	(67)
第四章 1631—1640 年	(84)
一、本时期刻印、传抄、创作的小说作品目录	(84)
二、本时期小说界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	(90)
三、本时期小说界的基本情况及其分析	(91)
第五章 1641—1650 年	(113)
一、本时期刻印、传抄、创作的小说作品目录	(114)
二、本时期小说界的基本情况及其分析	(118)
第六章 1651—1660 年	(141)
一、本时期刻印、传抄、创作的小说作品目录	(142)

二、本时期小说界的基本情况及其分析	(145)
第七章 1661—1670 年	(170)
一、本时期刻印、传抄、创作的小说作品目录	(170)
二、才子佳人小说继续丰富发展	(177)
三、白话短篇小说集的创新	(189)
四、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气象	(192)
第八章 1671—1680 年	(196)
一、本时期刻印、传抄、创作的小说作品目录	(197)
二、天花藏主人的创新努力	(201)
三、烟水散人及其小说创作	(209)
四、才子佳人小说发展的新趋势	(212)
五、古吴娥川主人与世情小说的重振	(214)
附录：才子佳人小说评议	(216)
第九章 1681—1690 年	(246)
一、本时期刻印、传抄、创作的小说作品目录	(246)
二、本时期小说界的基本情况及其分析	(247)
附录一：啸花轩刊印小说的种类与风格	(252)
附录二：17 世纪通俗小说著名刊工考	(257)
第十章 1691—1700 年	(262)
一、本时期刻印、传抄、创作的小说作品目录	(262)
二、本时期小说界的基本情况及其分析	(263)
附录一：17 世纪通俗小说难以确定年代的作品	(264)
附录二：17 世纪的小说评点概说	(268)
主要参考书目	(303)
后 记	(305)

序 论

17 世纪的中国,充满着创新、变异,因而与以往截然不同。无论是思想界还是经济领域、科技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①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这一世纪中叶,明清易代,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这给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文学界更是及时、生动、形象地记录了这一多变时代的各种表象与本质。错综复杂的世界、纷繁多变的生活、深邃精彩的思想,孕育了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使 17 世纪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其独特的时期。

一、17 世纪通俗小说发生发展的 社会背景

万历三十年(1602),著名思想家李贽去世;万历三十八年

① 这一时期有许多文化巨人,比如,徐光启(1562—1633),既是曾经担任过大学士的政治家,又是著名的科学家,学贯中西,精通天文、算术、水利等众多学科,编著《农政全书》,翻译《几何原本》,制定《崇祯历书》,这样一个人物竟然还是著名的天主教徒;再比如,傅山(1607—1684),字青主,既是著名的思想家,还是逻辑学家,研究《公孙龙子》成就很高,又是书画家,草书享誉千古,更是名医,所著《傅青主女科》是我国中医妇科典籍,至今仍有重要临床价值。类似他们这样的文化巨人的集中出现,正是这样一个独特时代的标志。

(1610),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去世。这两位人物,对晚明以后的思想界、文学界、科学界乃至后来中国的历史走向,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他们的去世,拉开了17世纪的序幕。

17世纪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自从16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封建传统因素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且这种冲击是全方位的,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哲学思潮到文学理论,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冲击。有的方面受此冲击而产生的变化,甚至可以天崩地解来描述。传统的封建经济形式与经济结构,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或者是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壮大(尤其是晚明),其落后性与腐朽性在对比之下暴露无遗;传统的占统治地位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为封建社会提供合理合法解释的思想基础,由于长期被绝对化、教条化、正统化,走向极端,这一时期遭到了它自身的反叛;一贯占统治地位的雅文学、文人文学,其地位则被新兴的俗文学、市民文学所取代。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封建社会内在的本质,在十六、17世纪的中国,其统治地位受到了挑战。这次以思想解放运动为标志的民族精神、社会形态的转化,虽然由于满族入关引起的民族矛盾加剧而中断,而且思想界由于汉民族政权的失败而对晚明的思想解放思潮重新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向封建思想复归,加上清初统治者的思想高压,最后结果仍然以传统的一切取得胜利而告终(包括清初雅文学的全面复兴),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石已被动摇,其神圣合理性被广泛怀疑。所以,在本世纪下半叶,文坛上活跃着的作家,其思想深处都还积极呼应着前期的自由与浪漫气息(这股潜流也为二十世纪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政权的改朝换代并没有带来文学创作上的根本改变。可是,一旦清代政权巩固,思想领域的控制收到实效,16世纪到17世纪初思想界的强烈震撼的影响逐渐消失(进

入 18 世纪,思想界转变了思想探究的形式,把思想追求寓于学术研究之中,早期的乾嘉学派体现出这样的价值取向,但这种倾向在大多数学者那里就不是那么明显了,18 世纪后期到 19 世纪中叶的思想界呈现出停滞不前、万马齐喑的局面),并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即使是传统的雅文学,进入清代中叶之后,其成就也远远不如初期了。

在如此巨大的时代震撼中,当时的文人思想与内心世界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文学被称为人类社会的心灵史,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显然也应该记录了这一历史的变迁。与思想解放思潮密切相关的小说创作,更可能以其独特的文体优势,形象地反映这一时代风貌,并在作品中体现这一时代精神。

17 世纪还是一个充满着转折的时代。按照封建时代最重要的标准来看,这一时代最大的转折是在本世纪中期,以少数民族为主的满清王朝入主中原,取代了汉族政权朱明王朝,而且在本世纪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奠定了几乎是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盛世(康雍乾时代,前后百余年,这在封建社会堪称不易)。这个王朝吸取了历代政权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其体制极为完备,统治颇为成功(虽然从本质上看,这一统治政权越稳固,越说明其时代精神的萎缩,清朝乾隆、嘉庆以后思想界的落后,未尝不是康熙以来政权稳固、思想一统的负面效应)。如果不是外敌入侵,我们相信它还会苟延残喘,再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然,这样的维持只能使中国继续拉大与世界的距离)。一个实力并不强盛的少数民族政权能一统江山并达到如此鼎盛(众多明史专家尤其是南明史家,一致认为清兵并没有绝对的实力打败明朝的残余军队,也未必能够打败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如果不是南明政权的自身腐败或者李自成的战略失误的话,清兵入关未必能够夺取天下),而且能延续这么长时间,这也是令曾经高

唱“岂有逆胡传子孙”的古人所难以想像的。这其中所体现的汉民族的精神状况尤其令人担忧。联系这一时期盛行的才子佳人小说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及这一现象背后所蕴藏的士人理想,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士人,在经历了种种政治打击和思想冲击之后,其精神境界和人生理想均与传统的士人有所区别,体现出一种巨大的转折。

这一时期与前此封建时代的转折有很大不同。表现在:其一,前一世纪儒家思想内部产生的变革思潮(主要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思想)在这一阶段继续发展,有的流派走得太远以至危及传统儒学的根本,反过来成为传统儒学思想最大的敌人。但是,明朝的灭亡却使它成了替罪羊,这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但戡然中断,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使知识界(包括思想界的某些精英)错误地认为程朱理学不但功大于过,甚至对治理国家、维系世道人心来说,完全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本世纪的思想界可以说一下子经历了两次大的转折。有这样的转折,当然要比长时间的思想一统更适宜文学的飞跃和革新。其二,本世纪中叶,推翻明朝统治政权、逼得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农民起义军,在满清入关之后,竟然能和南明政权合作(包括真正意义上的强盗,如郑成功家族,他们当初是真正的海盗,也成了支撑南明政权的中坚),拥戴各路小皇帝,前后坚持达数十年之久。这些农民起义军,当初绝对是官逼民反,与朝廷势不两立,但在面临民族矛盾时,阶级矛盾暂时被搁置一旁。可是,清兵入关后不久,即迅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并采取措施,争取汉族大地主、大军阀和知识分子的合作,于是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民族矛盾被逐渐掩藏,阶级矛盾再次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样的两次转折,对本世纪内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小说创作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比如晚明的时事小说,清初的《水

浒后传》、《女仙外史》等作品,如果联系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来分析,都会有新的认识。

尽管 17 世纪在历史上如此重要,但从小说史的角度来看,过去对这一时期的小说评价却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一方面,学术界一致认为,明末清初的小说达到了中国小说的最高峰,是小说的繁荣期。但是另一方面,这个明末清初指多长时间?如果是指 17 世纪的话(它包括明末的 44 年,清初的 56 年,应该是指比较标准的明末清初),那么学术界对这一时期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却一直评价不高。这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没有出现名著,小说创作成就不高。《三国演义》、《水浒传》早就出现,上个世纪有《西游记》和《金瓶梅》,下个世纪有《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本世纪有什么呢?如果与同一时期的雅文学相比,小说更显得自惭形秽。晚明时期的诗文创作成就远远超过明前期和中期,清初传统雅文学的复兴更是如火如荼;就是戏曲作品,这一时期也是佳作不断,临川派、吴江派、苏州派相继登场,本世纪下半叶还接连出现了《桃花扇》和《长生殿》两部杰作。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应该是各种文学大放异彩的时代,可是别的文学样式做到了,小说创作却在众多读者的期待中令人失望,尤其是长篇小说作品,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低潮,出乎人们的意料。

这样的评价从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并不符合小说发展的实际。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基于以下理由:第一,《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小说虽然在这一时期之前已经产生,但真正为广大读者所接受都是这一时期的事。它们被大量刊刻、评点,它们最流行的版本,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如果只有创作史,没有流传、接受史,那是算不上真正的小说史的。如果一部作品没有被读者接受,它就不能算做真正的完成,因为它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被激活。依据这样的原则,我

他们在讨论 17 世纪小说的时候,考虑的不仅是小说的创作问题,而是围绕白话小说的一切活动,包括创作、刊刻、评点、发卖、租赁等系列活动。这一时期,这些活动的所有方面都很繁荣,因此从这一角度看,本时期非常值得注意。第二,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它的发展过程需要一个由俗文学向雅文学过渡的阶段。没有这样一个过渡,没有正宗文人的加入(早期的小说作者,即使是文人,也带有书会才人的性质),小说的雅化、小说艺术的提高就不太可能。中国的诗歌、词、曲都早已完成了这样的过渡,而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正是在 17 世纪完成了这样的转变过程。所以,分析 17 世纪的通俗小说作品,考察它们由俗向雅过渡并发展到雅俗共赏的转变过程,对理解中国白话小说的艺术特性,显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第三,中国古代小说的评点,也以这一时期最为繁盛。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小说评点家,几乎都出现于这一时期。以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为代表(包括李贽、叶昼、冯梦龙、李渔等人),在各种序、跋及评点文字中集中讨论了中国古代小说许多方面的问题,总结了小说创作的经验教训,概括出许多的作法、读法,为之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上的准备。18 世纪古典小说达到高峰,与这一理论准备密切相关。

第四,中国古代小说著作众多,杰作亦不少,但是,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小说作家都是偶一为之,很少有毕其一生精力专心于小说创作者。也就是说,中国古代一直缺少专业的小说作家队伍。与李白、杜甫一生不断写诗,或者柳永“奉旨填词”因而不停歌咏的作家不一样,17 世纪前的小说作者几乎没有一个人写很多作品的情况。当然,有些小说作家也是终身创作的,但是作品不多,比如某些长篇小说耗费了作家一生的心血,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所以作家没有余力继续从事创作。其实,

即使像李白、杜甫等人也不能算是专业作家,因为他们不但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诗歌创作上,他们也不愿意仅仅以诗人自居。但是,在17世纪,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专业作家群体,以天花藏主人、烟水散人等为代表,他们每个人名下都有大量的小说作品,从创作到编辑(包括改编)甚至出版(他们创作的作品转眼间就能刊刻并在市场上发售),形成了一个系统而专业的小说写作出版机制。他们写作,既没有传统作家那种因抒情的需要而非写不可的冲动(当然这些作家也有通过小说创作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的意思,但这不是其创作的原始动力和惟一动机),也不仅仅是或者主要不是借创作以载道达到实施教化的目的。他们写作,有生活的需要,有利益的驱动,有个人兴趣爱好因素,等等。他们不断地写,有时候不惜重复自己;他们的写作,紧紧抓住读者的口味,迎合市场的需求。因此,他们的创作很受读者的欢迎,风行一时。这样的作家,才能被称为专业的作家。这种独特的情景只有晚清的报人小说出现后才再次形成。这一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第五,很早就有人说过,文学史毕竟不是几个天才人物文学活动的历史,文学史在尊重那些杰出人物、典型形象的同时,也应该关心“基本内容”、“基本心理”、“基本趋向”、“总体面貌与成就”。“天才”只有在具有整体感的叙述中,才有可能被安置在与他们的实际成就相应的位置上。^①本时期的小说界,也许并没有出现杰出的作家与伟大的作品,但是,正是在本时期,古代通俗小说酝酿着转型与创新、突破与飞跃。因此梳理这一时期通俗小说发展的轨迹,对理解整个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演变的过程与原因,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 赵园:《艰难的选择》,P6,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二、17 世纪通俗小说发生发展的文学背景

17 世纪,这是一个出现了众多思想巨人的时代,也是一个多种思想或想法并存的时代;中国传统雅文学的全面复兴与俗文学的等待复兴,构成了 17 世纪文学的独特风景。

划分文学史的阶段,人们历来习惯于用改朝换代作为区分标准(不仅是文学,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涉及到历史时,大家也习惯于这么做)。文学史上曾经有著名的论断“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①,认为每一朝代都有自己代表性的文学式样,并在这一朝代该文学式样达到极盛,以此来表明文学的发展确实与朝代的更替相关。这样的划分,因为唐诗、宋词、元曲的突出表现因而显得颇为合理。但是,就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文学发展并不与改朝换代完全同步,某一种文体更不会因为哪一朝代的兴盛而必然跟着兴盛,也不一定因为该朝代的灭亡就跟着衰落,难以为继。尤其是从所有的文学式样出发,不仅仅是讨论某一种文学体裁的时候,这一点显得更突出。我们只要注意考察一下两个朝代交替时期的文学发展情景,就能够得出新的结论。比

① 焦循《易余齋录》卷十五说:“夫一代有一代之胜,……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胜。”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开头就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如唐初诗歌(尤其是高祖与太宗时期),与隋代诗歌相比,并无二致;宋初诗坛,继承的仍然是晚唐五代的遗风(包括宋初词,与晚唐及五代词基本一致)。因此,即使“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样的论断成立,它也是指总体风格而言,并非是说一旦某个朝代建立,就立即产生一种新的文学风格或者导致某种文学体裁的兴盛。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认识深入人心,且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文学发展进程的认识。因此,研究两个朝代交替之间的文学发展过程,就显得很有意义。一个朝代的文学是怎样逐步向另外一个朝代过渡的,体现了怎样的特征,为什么会这样过渡,继承与抛弃了哪些东西,这些继承与抛弃的内容与新旧朝代的更替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对明清之交的文学进行研究,既加深对这时期文学本身的认识,也尝试探索改朝换代到底会对文学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

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其他如思想界与历史学界也是如此),人们经常用“明末清初”或“明清之际”之类的术语指晚明到清初这一时期(前者如“明末清初小说丛刊”等丛书、《明末清初小说述录》等专著,后者如《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明清之际苏州作家群研究》、《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等著作)。这说明人们同样认为明末到清初的文学,在许多问题上具有连贯性、一致性,并没有因为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而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晚明从明代什么时候开始,清初到什么时候结束,各位学者是各取所需,并无统一说法。同时,各人所理解的明清之际的时间跨度又与其本人所涉及的学科或研究对象有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一定照顾到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文学的共同特点。

为了更为准确地认识这一时期的文学,本书以世纪为划分单位,在不特别考虑改朝换代的政治因素的前提下,将明末清初的文学放在同一世纪内进行分析。这个世纪就是17世纪。17世纪,从表面看仅仅是个时间长度的问题,可是用“17世纪”而不用“明末清初”,一方面表示,即使明清的改朝换代必然、也确实对文学产生了影响,可是,如果综合考虑17世纪的各种文学及其样式(甚至社会背景、生活方式、哲学思潮、审美追求等其他方面)的发展特点,那么很明显,这一世纪的文学发展并没有因为明清易代而发生质的改变;恰恰相反,它们在很多方面显示出惊人的相似,保持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同时,以诗词文为代表的传统雅文学,在明代前期和中期的很长时间内并没有什么杰出的表现,但是,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它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而清代建立以后,传统雅文学就取得了全面的复兴,其代表人物都是由明入清的作家。即使入清以后方才走上文坛的作家,其基本风格都受到明末文学很大的影响。包括乾隆时期的袁枚,他所极力提倡的“性灵说”,不仅口号与晚明的公安派相同,而且思想传承也有接近之处(一般认为都与李贽的“童心说”有关)。过去一般认为清代无论诗词文(包括骈文)都远远超过元明两代,有些方面(尤其是综合起来看)甚至可与唐、宋相媲美;但是,细细分析一下,可以发现,清代雅文学的全盛时期应该在清初,雍正、乾隆以后,实际上是每况愈下,虽然仍有不少优秀作家,但整体上看,已经远远不及顺治、康熙时期了,而且个人风格以继承居多,独创较少。所以,人们在比较明清文学的异同时,将整个17世纪分割成前后两段,就显得极不公平。即使就清代本身而言,17世纪后期,与18世纪、19世纪相比,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它倒是与明末(17世纪前期)相当一致。因此,我们宁可以17世纪来作为区分的阶段,而不用习惯的明代、清代或

者明末清初的概念。

同时,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进程来看,17世纪也是一个极其独特的时期,它既是中国传统雅文学全面复兴的时期(也可以称作回光返照),诗、词、文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也是通俗文学由俗向雅转折、过渡的时期,虽然长篇小说由俗向雅过渡的最后完成出现在18世纪,那要等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的诞生,但是戏曲(如《桃花扇》、《长生殿》)与通俗短篇小说(如李渔的小说)的转折已经基本完成。由于这样的原因,这一时期的文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姿态,我们不妨将17世纪各种文学形式的代表作家作一简单列举,以说明情况:

一、思想界:

中国文学历来将思想著作看做是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思想著作本身不但是政论文,而且用文字表达思想,同样需要文学性。另外,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学术团体与文学团体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7世纪的思想界,呈现出极其活跃的、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面对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人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个时代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各种解决方案,由此而产生了众多的学术团体与政治派别。一方面,黄宗羲以《明儒学案》梳理着明代以来思想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成为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一环。稍作归纳,便可看出当时思想界的活跃情景。

1. 东林党:东林党因东林书院而得名。东林书院坐落在无锡城外,是宋代杨龟山聚众讲学之所,明代已经废为僧舍。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讨论三王并封和会推阁臣忤旨被削职,他回到无锡老家,约了好友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及其弟顾允成,来到东林书院讲学,东林书

院也因为常州知府欧阳东凤、无锡知县林宰的营建而恢复旧观。万历三十二年(1604),扩建的东林书院落成,顾宪成制订院规,阐明宗旨,在东林书院大会吴越士友,提倡实践,反对空谈,“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①。由于顾宪成等人在朝廷的威望和在士民中的威信,所以他们的议论往往能左右政局,影响很大。他们因此而形成的与阉党及其他党派的斗争(如齐、浙、楚),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文学纷争,是晚明政治生活(也是文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争论不仅延续到南明,甚至对清初政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主要体现为南党与北党)。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所提倡的注重实用的思想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17世纪最为重要的实学思潮。

2. 复社:代表人物有张溥(1602—1641,江苏太仓人)、张采(1596—1648,江苏太仓人)、陈子龙(1608—1647,江苏松江人)等。复社成立于崇祯元年(1628),它是在几社、闻社、南社、匡社等团体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政治组织,以“复兴古学”相号召。顺治九年(1652)被清政府取缔。这不仅是个政治组织、学术团体,还是一个思想标志,对明末清初的政治、思想甚至某些人物的个人命运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3. 黄宗羲(1610—1695),浙江余姚人。

4.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

5. 王夫之(1619—1692),先世为扬州高邮人,后迁移到湖南衡阳。以上三位号称“清初三大儒”,对他们的思想价值与理论贡献,前人论之已多,本文不再重复。

6. 颜元(1635—1704),他是“颜李学派”的创始人,该学派当

^①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